



华林甫 主编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第二册）

秦汉卷

段伟 著



齊魯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华林甫 主编

清儒地理考据研究（第二册）

秦汉卷

段伟 著



齊魯書社

秦 汉 卷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郡之研究	19
第一节 秦郡研究	20
第二节 西汉郡之研究	82
第三节 东汉郡之研究.....	204
第二章 县之研究.....	239
第一节 秦县研究.....	239
第二节 西汉县之研究.....	248
第三节 东汉县之研究.....	299
第三章 汉代王国、侯国研究	344
第一节 楚汉之际的诸侯王国研究.....	345
第二节 西汉的王国和侯国研究.....	355
第三节 东汉的王国和侯国研究.....	504
第四章 其他沿革地理问题研究.....	522
第一节 汉代州制研究.....	522

第二节 汉代道之研究.....	544
第三节 汉代小地名研究.....	548
第五章 自然地理研究.....	555
第一节 西汉自然地理.....	557
第二节 东汉自然地理.....	587
余 论.....	592
主要参考文献.....	598
后 记.....	622



绪 论

一、缘起

历史的定义有很多种，内容非常丰富。过去的种种人和事物都是历史。如何研究历史，前辈学人给我们做出了表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历史也是研究不尽的，思想家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①，虽然强调了历史的主观性，但无疑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历史研究只有无限接近于真实，但离真实总是有一丝隔阂，这样来看，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历史研究。前人的许多研究在当时来说可能无法再推进一步，但在后世学者看来，仍不免有遗漏或粗疏之处。从史料的角度来看，前代学者距离研究对象时间较短，能接触到更多的一手资料，做出的研究更为可信；但仍有事实证明，有些资料前代学者并没有机会看到，反而是后世学者机缘巧合得到，做出了更为精确的研究，这种后出转精的研究不在少数。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②近年来，出土简牍对于

^①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研究上古史、秦汉史帮助很大，里耶秦简、尹湾汉墓简牍、张家山汉墓竹简等，都使秦汉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重对历史的研究。先秦时期，史官的记载为我们留下记史的传统，也开启了研究历史的先河。而历史发展到清代，史学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瞿林东认为清代前期史学有总结与嬗变的特点，而到了后期，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就清代前期而言，历史考据成为当时史学的辉煌成果。^① 杜维运总结清代考据学成绩为：一、方法之客观而精密；二，产品之丰硕而细致；三，使中国史学进入纯学术研究之阶段。^②

清理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才能知道他们的关注点。他们会对同一问题感兴趣，通过考证，却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利用他们的研究，无疑能更上一层楼。

如钱大昕考证西汉比秦代所增的郡国，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高祖增二十六是：“谓河内、汝南、江夏、豫章、常山、中山、清河、魏郡、涿郡、勃海、平原、千乘、泰山、东莱、东海、广汉、定襄、桂阳、武陵、鄣郡、城阳、济南、楚国、燕国、淮阳国并内史也。”^③ 文景各六指：“文帝六，谓河间、菑川、胶东、胶西、庐江、衡山；景帝六，谓北海、济东（即东平）、山阳、济阴、江都、广川也。文帝建国九，济南、城阳因旧郡，济北即泰山郡；景帝建国九，中山、常山、清河因旧郡，济川国后废，故皆不数。”^④ 武帝二十八：“谓冯翊、扶风、恒农、陈留、临淮、零陵、天水、安定、西河、朔方、武都、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犍为、牂柯、越嶲、益州、元菟、乐浪、苍梧、交趾、合浦、九真、广平、真定、泗水也。”^⑤ 昭帝一指金城。^⑥ 之后，对于高帝、文帝所增置郡国，钱氏又有不同看法。他在《潜研堂文集》

①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70、737、707 页。

② 杜维运：《清代史学之地位》，载《清代史学与史家》，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 ~ 14 页。

③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0 页。

④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二》，第 140 页。

⑤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二》，第 140 页。

⑥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汉书二》，第 140 页。



中认为：“高帝增二十六：河内郡、汝南郡、江夏郡、魏郡、常山郡、清河郡、涿郡、渤海郡、平原郡、千乘郡、泰山郡、东莱郡、东海郡、豫章郡、桂阳郡、武陵郡、广汉郡、定襄郡、中山郡（后为国）、胶东国、燕国（后为广阳国）、淮阳国、楚国、衡山国（后为六安国）、内史（武帝为京兆尹）、鄣郡（武帝为丹阳郡）。文景各六：庐江国（后为郡）、济南国（后为郡）、河间国、淄川国、胶西国（后为高密国）、城阳国。以上文帝置（文帝置国凡九：衡山、胶东，高帝尝置；济北即高帝所置之泰山郡，故不数）。”^①全祖望对此问题也很关注，得出的结论却大不同。高祖增二十六，全祖望认为：“案志数之：河上、中地（即二辅）、河内、汝南、江夏、魏、常山、清河、涿、渤海、平原、千乘、泰山、东莱、东海、豫章、桂阳、武陵、广汉、定襄、中山、燕（即广阳）、胶东、淮阳、楚、衡山（即六安）。东海与楚本秦置，武陵本秦黔中，则实止二十三郡，而溷列之（其燕本秦之广阳），姑勿以咎班氏也。而夷考之，则高帝时郡国正不止此：济南、城阳、高密（本胶西）、河间、庐江、广陵（本东阳）、丹阳（本鄣）……右核实：凡高帝时郡国，在秦置外者，得三十。”文、景各六，“案志数之：（文帝）济南、城阳、胶西、淄川、庐江、河间。志言昭帝少时仅增其一，而不知文帝之玄嘿，实未尝有六郡也。其五郡皆高帝时所置，明见纪、传、表，而志溷列之，盖文帝仅增一淄川。案志数之：（景帝）山阳、济阴、东平、北海、信都、江都（即广陵）。广陵本东阳，景帝改江都，非也。景帝实置广平，见《水经注》。而王温舒为都尉于广平，事在武帝征和之先，然则志误矣，当以易江都。其陈留本济川，景帝以封梁王子，见《水经注》引应劭语，不置自武帝也。右核实：文一景七，连高帝时郡国，得三十八”。武帝增二十八，“案志数之：河西郡四、西南夷郡五、南粤郡七、东海夷郡三、朔方（以上皆初郡，凡十九）、弘农、陈留、临淮、零陵、天水、安定、西河、真定、广平、泗水（案东海夷郡除暂置者不计，惟数乐浪、玄菟，则三应作二，至朔方下原注，亦似有讹脱，未敢意改）。右核实：但多陈留、广平，说见前，然是二十九非二十八也。今去其二，凡武帝置郡

^①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六《汉百三郡国考》，《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3页。

国,得二十七”。^① 全祖望与钱大昕的观点多相异,挖掘他们之间的异同,不仅可以还原历史真实,也能找到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

其他如对秦郡数目、秦代象郡、汉代州郡的研究,相异成果很多。这些研究对后来王国维、谭其骧以至今天周振鹤、辛德勇等秦汉历史地理学者的研究都有启发。今天的学术进步是因为有清代学者的深厚积累。

清代学者所处学术环境艰苦,没有电脑查询,找寻资料不便,相互交流也不多。虽然他们之间确有交流,如钱大昕与王鸣盛为姻亲,交流较多,洪亮吉与钱大昕之间也有学术书信往来。但学术资讯传播还是较为困难,以致他们会有相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细小考证居多,此不赘述。清代学者对于以往舆地考证成果繁多,主要集中在对于疆域范围、政区数目、政区制度、建置兴废、地域通称、治所变迁、郡县地望、地理形胜、古迹遗址、同名异地、一地多名、地名源义等类问题的考证。我们清理他们的考证成果,也会避免自己在今后的研究中做重复工作。

正因为清代学者有大量的相同或相异的研究成果,所以其价值显得尤为重要,提醒后来学者可以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二、以往研究评述

有清覆亡以后,就有学者开始总结清代的学术成绩。梁启超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撰写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②以及《清代学术概论》^③、《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④,篇幅虽然都不太大,但影响深远。钱穆也曾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⑤,影响也极大,多次再版。有学者认为,相当长时间里,梁、钱二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清代学术史领

^① 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一《汉百三郡国增置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4~2496页。此版有缺文,据四明丛书本补。

^②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域影响最大。^① 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②,支伟成著有《清代朴学大师列传》^③,对清代重要学者逐一介绍,但失之简略。

近年来,学者对清代史学的研究非常重视,不断有学者对清代史学进行整体研究,著作主要有黄建斌《清代学术发展史》^④,罗炳绵《清代学术论集》^⑤,杜维运《廿二史札记考证》^⑥《清代史学与史家》^⑦《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⑧,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⑨,王俊义等《清代学术与文化》^⑩,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⑪,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⑫和《乾嘉学派研究》^⑬,祁龙威、林庆彰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研究》^⑭,黄兆强《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⑮,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⑯,罗炳良《十八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⑰《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⑱《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⑲,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史·清史卷》^⑳,刘墨《乾

^① 罗志田:《导读: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 页。

^② 徐世昌等:《清儒学案》,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③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 1986 年版。

^④ 黄建斌:《清代学术发展史》,幼狮书店 1974 年版。

^⑤ 罗炳绵:《清代学术论集》,食货出版社 1978 年版。

^⑥ 杜维运:《廿二史札记考证》,洪氏出版社 1978 年版。

^⑦ 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4 年版,中华书局 1988 年影印。

^⑧ 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学生书局 1989 年版。

^⑨ 胡楚生:《清代学术史研究》,学生书局 1988 年版。

^⑩ 王俊义等:《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⑪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⑫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⑬ 陈祖武:《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⑭ 祁龙威、林庆彰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研究》,学生书局 2001 年版。

^⑮ 黄兆强:《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稻乡出版社 2000 年版。

^⑯ 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崇文书局 2001 年版。

^⑰ 罗炳良:《十八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⑱ 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⑲ 罗炳良:《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

^⑳ 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史·清史卷》,黄山书社 2002 年版。

嘉学术十论》^①。杨向奎鉴于徐世昌《清儒学案》之不足,主编了《清儒学案新编》^②。

日本学者对清代学术史也有浓厚的兴趣。著作主要有:森本竹成《清朝儒学史概说》^③、武内义雄《燕京读书记——清朝学术史》^④、滨口富士雄的《清代考据学之思想史的研究》^⑤、近藤光男《清朝考证学的研究》^⑥。

西方学者对清代史学成就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艾尔曼注重清代的思想史,撰写了《清代各学派研究》^⑦、《从中国寻找证据:清代学术和幕府时代日本的考证学》^⑧、《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⑨等论著。麦哲维有《重建诂经精舍:俞樾和太平天国后的考据学,1864—1881》^⑩,柯维麟有《考证学派的学术研究、学术价值,方法与解释:对崔述(1740—1816)和儒家经典著作的

① 刘墨:《乾嘉学术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②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1994年版。

③ [日]森本竹成:《清朝儒学史概说》,文书堂1930年版。

④ [日]武内义雄:《燕京读书记——清朝学术史》,《武内义雄全集》第10卷,角川书店1979年版。

⑤ [日]滨口富士雄:《清代考据学之思想史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83年版。

⑥ [日]近藤光男:《清朝考证学的研究》,研文社1987年版。

⑦ [美]Benjamin A. Elman, *Ch'ing Dynasty 'Schools' of Scholarship*, in *Ch'ing Shih Wen T'i*, Vol. 4, No. 6, December 1981, pp. 1~44.

⑧ [美]Benjamin A. Elman, *The Search for Evidence from China: Qing Learning and Koshogaku in Tokugawa Japan*, Joshua A. Fogel, ed. Late Qing China and Meiji Japa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3, pp. 158~184.

⑨ [美]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s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另有中文版,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⑩ [美]Steven B. Miles, *Rebuilding the Gujing Jingshe: Yu Yue and Evidential Research in the post-Taiping era, 1864—1881*, in *Virginia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Vol. 3, Fall 2011, pp. 95~116.

反思》^①。

除上述总体性研究外,也有学者聚焦清代某位学人,进行较为详尽的研究。如杜维运《赵翼传》^②、仓修良《章学诚评传》^③、陈金陵《洪亮吉评传》^④、顾吉辰《钱大昕研究》^⑤、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⑥。这些专人研究,主要针对一位学者进行研究,篇幅较长,自然比总体学术史更为深入。也有学者做清代学者考据学的个案研究,如徐道彬《戴震考据学研究》,对戴震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目录、版本、辑佚、辨伪 8 个方面的考据成就做了细致分析,可惜对戴震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贡献虽有涉及,仍失简略。^⑦ 甘秋卉在其硕士论文《杨守敬——中国传统地理学之集大成者》中,较为详细地剖析了杨守敬的传统地理学成就,指出其在《水经注疏》《历代舆地图》及《隋书地理志考证》的具体成就,虽然没有囊括杨氏地理学成就的全部,但评论仍较为可观。^⑧

王鸣盛以《十七史商榷》最为知名。撰写此书时,王鸣盛非常辛苦,“暗砌蛩吟,晓窗鸡唱,细书饮格,夹注跳行。每当目轮火爆,肩山石压,犹且吮残墨而凝神,搦秃毫而忘倦。时复默坐而玩之,缓步而绎之,仰眠床而寻其曲折,忽然有得,跃起书之,鸟入云,鱼纵渊,不足喻其疾也”^⑨。他对此书也非常看重,认为:“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寥葛,地理职官,眼眩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

^① [德] Michael Quirin, *Scholarship, Value, Method, and Hermeneutics in Kaozheng: Some Reflections on Cui Shu(1740 – 1816) an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5, No. 4, December 1996, pp. 34 ~ 53.

^② 杜维运:《赵翼传》,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 1985 年版。

^③ 仓修良:《章学诚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陈金陵:《洪亮吉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⑤ 顾吉辰:《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⑥ 白兴华:《赵翼史学新探》,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⑦ 徐道彬:《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⑧ 甘秋卉:《杨守敬——中国传统地理学之集大成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991 年硕士论文。

^⑨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上海书店 2005 年版,第 2 页。

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①

清代学者对《十七史商榷》有很多评价。江藩认为《十七史商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②。而李慈铭认为此书“与钱先生《廿二史考异》、赵先生《廿二史札记》，皆为读史之津梁。赵先生意主贯串，便于初学记诵；此书与钱书则钩稽抉摘，考辨为多，而议论淹洽，又非钱之专事考订者比矣”、“此书考核精审，议论淹通，多足决千古之疑，著一字之重……为读史者必读之书”。^③

《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为清代考据三大名著，周振鹤曾撰文《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指出钱、赵、王三人之学问有龙、虎、狗之别，《廿二史考异》是点石成金之著，《廿二史札记》是披沙沥金之作，《十七史商榷》则是脸上贴金之滥竽^④，认为《十七史商榷》的价值低于《廿二史考异》。

目前详细研究王鸣盛学术生涯的著作有三部：一是张惠贞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研究》，二是刘玲的《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三是施建雄的《王鸣盛学术研究》。

台湾学者张惠贞撰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研究》（上下册），系其在高雄师范大学1996年的博士毕业论文《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分为九章。第一章，王鸣盛之生平、学术背景及著作述评；第二章，王鸣盛之史学思想；第三章，王鸣盛之治史目的；第四章，实证之史学方法；第五章，重视文献学的功用；第六章，典章制度之考察；第七章，舆地沿革之考证；第八章，论史实与史书；第九章，结论：《商榷》之特色及其评价。在下册中有专设第七章“舆地沿革之考证”，从“文字校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第3页。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页。

③ 王利器纂辑：《越漫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④ 周振鹤：《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读书》1995年第3期。



勘”“补阙遗”“对地理志之评论”和“建置沿革之考察”四方面探讨《十七史商榷》的舆地学成绩。^①

《王鸣盛学术研究》为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施建雄的博士论文^②。全书主要内容除《绪论》外，共有八章。全书联系康雍乾时期广阔的社会、学术背景，跨越考证学、经学、地理学和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对王鸣盛的学术渊源及治学特点、历史观点及经学见解、史学思想及历史考证。第二、三章讨论《十七史商榷》的考证成就与学术价值。第四章讨论《蛾术编》。其中，第二章“《十七史商榷》的考证成就与学术价值（上）”的第二节“历史地理考证的通识”，以及第四章“子学代表作——《蛾术编》”的第二节“历史地理考证的深化”，专门探讨王鸣盛在历史地理考证中的成就与局限。施建雄认为，王鸣盛在历史地理考证的通识研究表现在：（一）正史志建置沿革记载规律之总结。（二）唐以前州郡国建置变迁的历史考察。（三）汉唐之际州郡治所设置的深入辨析。施建雄在论述王鸣盛对历史地理考证的深化中，从（一）探究分裂时期之疆域与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二）厘清史籍记载山东及江东地域之内涵，（三）论汉唐之际民族与文化地理等三大方面予以详细论述。《王鸣盛学术研究》一书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王鸣盛在历史地理学中取得的成就。但因为全书主要是从史学史的角度出发，故对王鸣盛的历史地理考证成就只能举例总结，无法细致分析。

《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是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刘玲的博士论文^③。在此书中，作者参考了海内外大量的有关王鸣盛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张惠贞的著作被遗漏了。虽然没有参考张书，但因研究对象的一致，刘玲的著作仍有章节与张氏相似。在书中，除绪论外，作者分八章对《十七史商榷》予以解读。第一章，王鸣盛的时代及其学术；第二章，《十七史

^① 张惠贞：《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研究》，花木兰文化工作坊 2005 年版，第 303 ~ 352 页。

^② 施建雄：《王鸣盛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刘玲：《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商榷》的意旨；第三章，《十七史商榷》的考证（上）；第四章，《十七史商榷》的考证（下）；第五章，《十七史商榷》的史论；第六章，《十七史商榷》的文献学见解；第七章，《十七史商榷》的研究方法；第八章，《十七史商榷》的地位与影响。就历史地理考证而言，刘书在第三章专设“辨明地理”一节予以探讨，内容较张书薄弱。

研究钱大昕学术的成果也极多，各项论著合计不下 100 余篇。就历史学而言，一般学者很少注意钱大昕在历史地理方面的成就。目前学者对其历史地理研究予以评述的主要有以下论著。高文杰在其硕士论文《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的考史成就》中，曾用一节探讨“舆地沿革考证”^①。戴逸撰有《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②，王记录也有《钱大昕的史学思想》^③，都提到钱大昕的历史考证成就。专门研究钱大昕历史地理成绩的文章很少，华林甫撰有《钱大昕的舆地学贡献》，探讨其在政区沿革、地名学等方面成就，指出其“在舆地学上的贡献是同时代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就是后人也难望项背，他的学术观点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④。

限于篇幅，以上仅仅列举了有关清代学术研究的部分作品，还有大量的论著没有提到。综观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前辈学者对清儒历史地理考据成果多是宏观性的介绍或定性研究，即使是对某位学者的专门论述，也很少会详细介绍这位学者具体的研究成果。从研究主旨来看，也不允许研究者花大量篇幅去分析清代学者的各项具体成就，所以都仅是提纲挈领的介绍。这些概要性的研究能给我们描绘清代学者的成绩和地位，却不能让我们明晰清代学者的具体研究，不能在微观上给我们指导。

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但我们的学术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

^① 高文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的考史成就》，吉林大学 1995 年硕士论文，第 42~44 页。

^② 戴逸：《乾嘉史学大师钱大昕》，《文史哲》1997 年第 3 期。

^③ 王记录：《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④ 华林甫：《钱大昕的舆地学贡献》，《史苑》第 6 期。

础上的,不是凭空新建的,所以,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异常重要。一方面,如果前人做出了正确研究,我们就不会做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即使是前人未完成的或错误的研究,对我们的工作也有启发或者说告诉我们哪条路是行不通的。

所以,宏观指导固然重要,研究者也多,微观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可以推动我们去解决具体问题。

三、本书研究旨趣与理论、方法

有关秦汉历史的记载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纪》《后汉纪》《东观汉记》等文献。后代学者主要根据这些文献研究秦汉历史。秦汉王朝作为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盛世王朝,时间长达四百余年,影响深远,引发后代学者无穷的兴趣。自魏晋以来,不断有学者对秦汉历史进行研究,主要是对前四史进行注疏,我们现在研读前四史,就必须参考这些注疏。至明代,学者对汉代的研究兴趣丝毫未减,撰写了《史记评林》《汉书评林》等成果。朱志先以《明人汉史学研究》为名,对明代学者在汉史研究方面的成果综合评述。^① 据朱书统计,《千顷堂书目》中所列明人研究汉史著作 121 部^②。明人研究秦汉史,朱书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有三个特点:一是评论汉史史实,即对《史记》《汉书》等汉史著中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进行分析、点评;二是以评析《史》《汉》笔法为主,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来点评《史》《汉》的文笔;三是以考据为主,对汉史事实、制度、名物等考订其是非,考究其源流。^③ 但很显然,明代学者在考据时对历史地理关注很少,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些历史地理考证,但实际上此书是在清代时完成的,应该算清代学者。^④ 要论以往学者对秦汉时期

^① 朱志先:《明人汉史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 据朱志先“《千顷堂书目》中所列明人研究汉史著作一览表”统计,《明人汉史学研究》,第 367~372 页。

^③ 朱志先:《明人汉史学研究》,第 345 页。

^④ 有学者认为《日知录》自明崇祯末开始撰写。但曹江红认为康熙元年后始撰更为合理,见曹江红《〈日知录〉纂修考》,《浙江社会科学》1999 年第 6 期。

历史地理的考证研究,还得看清代学者的成绩。

清代考据成绩斐然,留下了很多著述。有的是以专书留下,更多的是以单篇文章行世。我们最熟悉的有关秦汉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虽与前二书同负盛名,但对历史地理考据并不多)。其实,钱大昕还有《诸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王鸣盛有《蛾术编》,赵翼有《陔余丛考》,都涉及具体考证。有关历史地理考证,我们较为熟悉的还有(以作者汉语拼音为序,下同^①):

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7卷;

崔适《史记探源》8卷;

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2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地理考证》1卷;《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后汉书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西南夷地理考证》1卷;《西羌传地理考证》1卷;《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南匈奴地理考证》1卷;《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1卷;

洪饴孙《汉书地理志考证》;

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4卷,《史记天官书补证》,《读书从录》;

黄大华《汉志郡国沿革考》1卷;

李光廷《汉西域图考》7卷;

刘文淇《楚汉诸侯疆域志》3卷,《项羽都江都考》;

刘庠《后汉郡国职方表》;

吕吴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4卷;

毛昌杰《续汉书郡国志释略》1卷;

钱大昭《汉书辨疑》22卷,《后汉书辨疑》11卷,《续汉书辨疑》9卷,《后汉书补表》8卷,《后汉郡国令长考》1卷;

钱坫《汉书八表注》10卷;

钱坫撰、徐松集释《新斠注地理志》16卷;

① 本书目参考首都师范大学孙文泱教授搜集的正史参考资料目录。